

谒张骞墓

何洪



两陷胡营因走廊，茫茫瀚海筑桥梁。驼铃声里烽烟道，旋舞琵琶入殿堂。

张骞，这个名字最近广为国人所知，一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二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张骞墓地成为这项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点。

张骞的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他两次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和西域各国交往的大门。他一生中有十几年都是在西域或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度过。张骞出使西域是越过匈奴领地去大月氏联合夹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张骞被匈奴所虏，被扣十余年才逃出来，最终到达出使国。史书中说他在匈奴期间“持节不失”。汉代使节多不辱使命，即使身陷胡营，仍持节不失。汉代出使匈奴的使者苏武被匈奴扣留19年，“仗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坚拒诱降。张骞逃出胡营后，继续西行，使命在身，义无反顾。在返途中又一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后，他乘匈奴内乱逃回长安。此次出行，张骞带回大量西域及中亚信息，为汉武帝制定西域战略提供重要依据。因此，他被受封为博望侯。此后，张骞作为卫青的部属参与对匈奴的战争。不久，他又第二次出使西域乌孙，并派副使出使更多国家。返回后不久，张骞即去世，归葬家乡汉中城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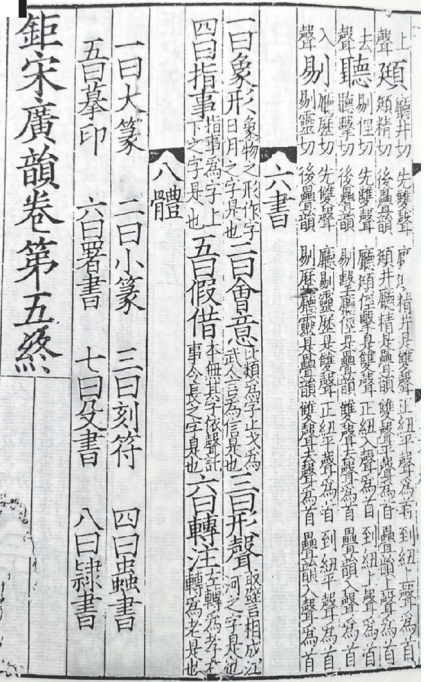
张骞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西域进行的，西域也成就了张骞。即便他跟随卫青征战匈奴，其贡献也在于他掌握匈奴境内的地理情况，对击败匈奴取得很大帮助。在一次作战中，他因误期而获罪被降为庶人，显然军事不是张骞的长项，然而在外方面，张骞却是尽展才能，虽然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未能达成联合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的目的，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征服了西域。史书中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然骞凿空，诸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后来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者都以博望侯称，以取信于西域各国，由此可见张骞在西域各国的名望。张骞在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派多名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中亚各国。去世后，张骞所派遣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几乎都和所出使之国的使者一起回到汉朝。从这时起，西域及中亚各国开始与汉朝相互往来。不仅如此，张骞在西域见到邛崃山出产的竹杖和蜀地出产的布，从而发现了从四川经云南到印度一带的蜀身毒道，一条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道路，并由此和滇越产生交往，而这条南方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道路就是著名的“茶马古道”。

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从此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贸易活动络绎不绝，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在西域及大月氏受到青睐，丝绸成为这条道路的重要货物，在一些地区甚至还起到货币的作用，后人因此称之为“丝绸之路”。在物品的交流中，这条路将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传播至西方，又从西方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香料、玻璃器等物种、物品到中原；在文化和技术交流中，西域的乐舞、服饰、宗教传入中原，中原的打井、造纸、印刷术、冶铁传到西方。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至唐代达到鼎盛，唐长安成为国际都会，西域使节、商人、学者、僧侣纷至沓来，西域歌舞更是风靡长安，胡服、胡乐、胡马，一片“胡风盛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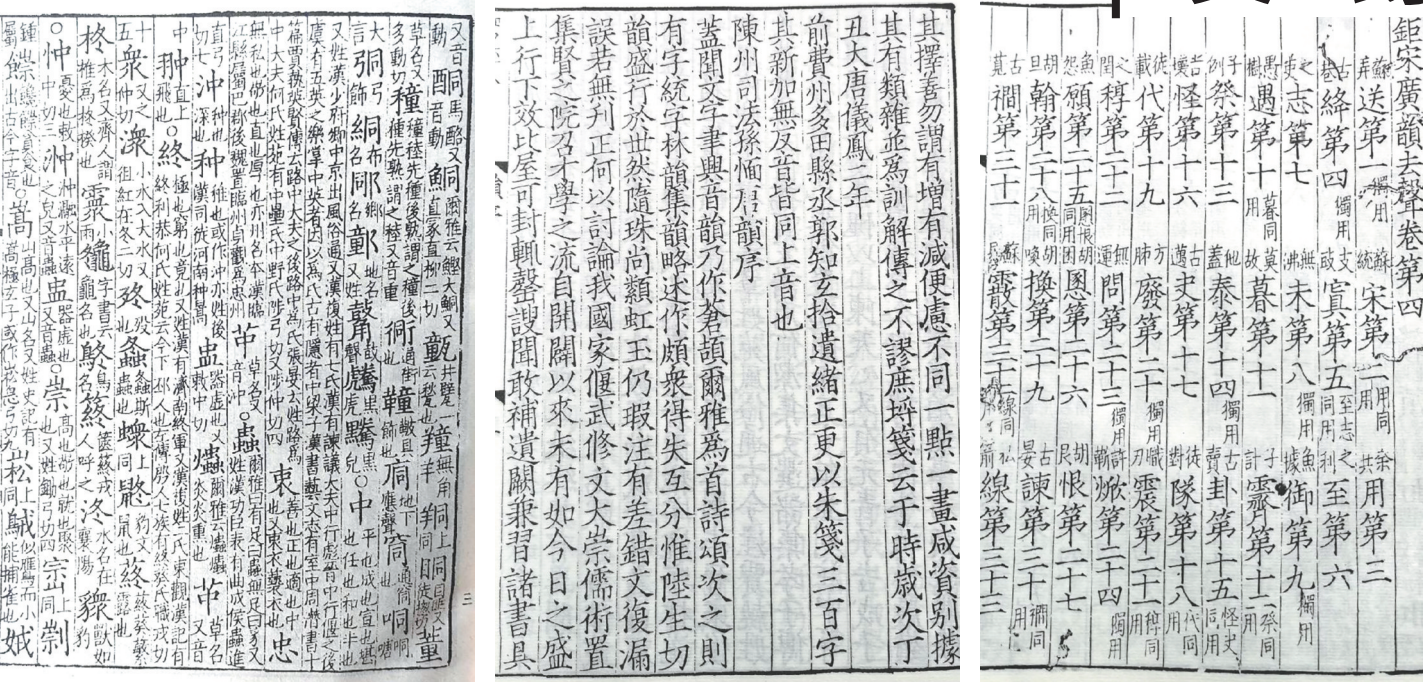
1000多年前，张骞归葬家乡，其墓冢规模不大，如今只存封土一座，坐北朝南，呈覆斗形，东西、南北各长15米，高8米。墓前竖有石碑三通，汉代石翼兽一对。石碑皆清代以后所立，正中一通上书“汉博望侯张公墓”，为清陕西巡抚毕沅书立。墓前石翼兽呈“S”形，细腰、昂首、卧姿，兽头及四肢均不存，仅有躯干，雕刻粗犷，风格抽象，汉风显著，使人不由想到霍去病墓的石雕。墓的右前方有一通民国石碑，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于1939年所立，题为《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该校讲师吴世昌撰文，该校教授黎锦熙书丹，记述了西北联合大学对张骞墓的增修，以及发掘过程中发现的文物。

碑阴刻班固《汉书·张骞传》全文，由该校教授许寿裳书。1938年，临时迁址于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委员会组织对张骞墓进行发掘。散居于墓周围多个村落的张氏后裔得知后，认为祖先坟墓被人挖掘是奇耻大辱，遂集合千余人，胸带“张氏后裔”红布条，守卫张骞墓。西北联合大学为避免事态扩大，婉称本校只是欲修缮墓冢，并非掘墓，愿停止发掘，封闭墓道，并树碑留念。于是，纷争平息，留下这通《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不久，西北联合大学在校内举办博望侯墓道古物展览，有封泥一方，上有篆书“博望铭(或造)”，由此可证此墓为张骞墓。此前，虽史记记载张骞死后葬汉中，但没有确切地点，人或疑为“衣冠冢”。西北联合大学的发掘，确定此墓为张骞墓无疑。

整个墓地占地12亩，古柏浓郁苍翠，庄严肃穆。张骞的“凿空”壮举，为东西隔离的世界搭建了联通的桥梁，世界在交流中进步。如今，张骞墓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为世人所瞻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末版《钜宋广韵》影印本



“结一庐”及其遗珍

郝蕊蕊

1980年春节，上海图书馆受捐了一批稀世古籍，馆长顾廷龙兴奋得直呼“价值连城，价值连城”。此言是否有点耸人听闻？且看其总目及总数：宋刻本24种，531册；元刻本38种，374册；明刻本178种，1441册；明抄本11种，84册……共计450种，3274册。

古籍捐献者名张子美，为张受玲堂兄，也就是张佩纶的嫡孙。因此，不少人以为该批古籍若非张子美所藏，便是其岳丈李中堂所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张佩纶原配夫人是朱芷萝，为大理寺卿朱学勤之女，而朱氏乃有清一代数一数二的藏书家，故这批古书实际出自晚清塘栖古镇声名煊赫的“结一庐”。

“结一庐”主朱学勤私家藏书的主要来源有三：

一是京城和硕怡亲王府的“明善堂”。“明善堂”主乃康熙十三子和硕怡亲王胤祥。在四库开馆时，怡亲王府被免于进呈皇家藏书，所以得以留下大量珍善孤本。辛酉政变后，胤祥五世孙和硕怡亲王载垣被赐自尽，“明善堂”藏书流入民间。除了何绍基、王懿荣、萧敦敏、钱孙保等学者零星搜购外，大宗收购者则以聊城“海源阁”、塘栖“结一庐”、苏州“滂喜斋”、常熟“瓶庐”为主，而所获之丰则以“海源阁”和“结一庐”为最。至于“明善堂”，其藏书的最大来源乃康熙重臣明珠次子，素有“满洲第一藏书家”之誉的纳兰揆叙的“谦牧堂”，由此亦见“明善堂”藏品的非同寻常。清代藏书界将私家藏书分为三类：售书者之藏书、藏书者之藏书、读书者之藏书，而“谦牧堂”藏书自然属于“读书者之藏书”，故其学术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如赵沅《春秋左氏传补注》、《春秋原图》、《宋刻真文忠公读书记二十二卷》、詹初《宋国流流唐詹先生集》、李曾伯《可斋杂稿》、郑樵《通志遗稿》、汪莘《方壶存稿》、王崇德《童溪王先生易传》等即是。

二是塘栖古镇大名鼎鼎的“丹铅精舍”。该藏书楼的前身为嘉庆年间劳经原所创之“味经斋”，后经其三子劳青玉、劳翼卿及劳季言不断扩充和精心校理，遂在当时自成一派。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塘栖大战前夕，劳家将其藏书中的精绝者挑出60多皮箱，装箱运往祖宅地永泰村，欲匿之于劳氏

宗祠。然而，船刚行至现在的德清县雷甸乡武林头(当年叫“武林渡”)一带，便遭乱兵和暴民劫掠。劫匪以为这么多鹿皮鞋箱子装满了金银细软，但开箱后却大失所望，原来里边都是些泛黄的破旧书册，有的甚至还散发着霉味。于是，便把箱内之物全都弃置河中，而珍贵的鹿皮鞋箱则被悉数掠走。倒是忠王李秀成，在杀进塘栖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往“结一庐”寻访图籍。但遍查藏书楼也未见什么稀有版本，于是他大惑不解地问他身边人：“都说劳家所藏皆为世间珍稀刻本，为何这里都是些寻常之物？”

经武林头一劫，“丹铅精舍”流传下的藏品已无宋元旧籍。即便如此，劳翼卿和劳季言善钞、精校、细注的明抄本也十分珍贵，其中就有卢文弼手校的《鬼谷子》、文徵明旧藏的《南窗记谈》、影宋钞本《游宦纪闻》、影宋钞本《大唐类要》、钱谦益校藏的《禅月集》等。这些流散在外的珍品最终归于杭州丁国典的“八千卷楼”、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江阴缪荃孙的“艺风堂”、苏州潘祖荫的“滂喜斋”、吴兴刘承幹的“嘉业堂”、江安傅增湘的“双鉴楼”、南京邓邦述的“碧群楼”、海盐张元济的“涵芬楼”、武进董绶经的“诵芬室”。

但所获最多、版本最精者则为塘栖朱学勤的“结一庐”。实际上，朱家和劳家是世交，劳季言4岁起即随朱学勤之父朱以升研读经学，而朱以升是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曾助龚自珍写成《西汉君臣称春秋之义考》。嘉庆年间，劳经原刊刻《尔雅匡名》一书时，也是朱以升助其参校。1870年，朱学勤丁忧返乡，遂大举收买“丹铅精舍”流散之物，此举与其说是意在丰富“结一庐”贮藏，不如说是不忍睹劳氏父子两代的无尽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要知道，劳季言和劳翼卿就是因为曾给劳门带来无上荣耀的家族藏书一旦之间毁于其兄弟二人之手而忧愤成疾，并于1864年先后谢世，时年均甫过不惑。

三是苏州的“艺海楼”。顾湘舟当年专门在其私家园林“辟疆小筑”中建藏书楼“艺海楼”，楼上樟木书橱环立，藏书多过10万卷，楼下则为“吉金乐石斋”，所藏皆商彝、周

鼎、晋帖、唐碑之属。时人称其藏书“不及四库者600余种，而四库未及者2000余种”。当年，太平军占苏州时，“艺海楼”因其所聘书画鉴定大师徐康与太平军高级将领私交甚厚而得以安然无恙。但在劳氏兄弟去世的那一年，太平军从苏州败走。这时，新任江苏巡抚丁日昌以“惩通敌，封逆产”为名，公然派官兵查封“艺海楼”，并将其中的珍本成捆地装车抄走，因此才成就了其藏书之富称雄一时的“持静斋”。对此，“皕宋楼”主陆心源直称其为“强取豪夺”。而其他流落在外的“艺海楼”珍品则有不少为朱学勤搜求购得，尤其是诸如《吴中金石志》《玄妙观志》《七姬庙志》等方志类文献甚是珍贵。

现在，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朱学勤重外孙张子美于20世纪80年代所献“结一庐”劫余所传宋刻本：《史记集解索引》(130卷)、《晋书》(130卷)、《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卷)、《西汉会要》(70卷)、《古史》(60卷)、《通鉴纪事本末》(42卷)、《东汉会要》(40卷)、《皇朝仕学规范》(40卷)、《淮海集》(40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皇朝编年要》(30卷)、《古灵先生文集》(25卷)、《古灵先生文集》(年谱卷)、《礼记》(20卷)、《说苑》(20卷)、《刘子》(10卷)、《才调集》(10卷)、《翻译名义集》(7卷)、《钜宋广韵》(5卷)，以及《杜荀鹤文集》《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赵清献文集》《京本点校附重章重意互注周礼》《西山真文忠公读书记》。至此，上述顾廷龙所言之“价值连城”尚可谓“信哉斯言”。

朱学勤生于道光三年(1823)，卒于光绪元年(1875)。虽然他一生淹贯经史、博通典籍，但其治学的宗旨则是“通经致用”。早年，在户部主事时，朱学勤就对国家财政税收制度之得失有过深入的考察及思考，并撰有《国用岁出入总数考》。去世前13年，朱学勤一直领军机处，是同治朝军政事务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甚大，令朝野刮目相看，曾国藩亦尝嘉许其“学足论古，才足干时”。当年，朱学勤在世时即有“大清贾谊”之誉；今天，“结一庐”遗珍依然在嘉惠吾人，并彰显华夏文明之绵绵不绝及独步天下。

湖南博物院藏传铜鎏金无量寿佛像背后的故事

刘侏妮



图1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正面、侧面、背面)

湖南博物院藏金铜佛教造像门类丰富，其中北传佛像类型多样，可构成较为完整的佛像谱系；藏传佛像尽管数量相对较少，但不乏精品，包括如下兼具艺术品质和研究价值的无量寿佛像。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图1)，为清中晚期，高17.8厘米，座11.3厘米×8.3厘米。耳穿耳珥垂肩，面相丰满，眉毛细长，双目低垂，似沉思状，体型纤细健美，体态婀娜，上身袒露，造型优美，胸前饰有连珠纹、帔帛与璎珞，皆绕双臂于身体两侧。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双手相合结禅定印。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图2)，为清代，高13.4厘米，座8.7厘米×6.6厘米，容貌清雅，头戴五叶宝冠，发髻高耸，耳坠圆珥。飘带轻盈，自背后缠绕，犹如背光；袒露上身，佩戴各类精致顶圈、臂钏、手镯等饰品；下着薄透长裙，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之上。

在藏传佛教造像领域，佛教界流传一种说法，即阿弥陀佛拥有13个名号：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静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其中，无量寿佛位列首位。梵文中的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因此在民间无量寿佛又被尊称为长寿佛。芸芸众生，皆向往长寿与永恒之生命。清代乾隆皇帝向往无量寿佛的“佛缘”，更是达到了极致。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1736—1795)，前



图2 湖南博物院藏铜鎏金无量寿佛像(正面、侧面、背面)

后共60年。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这一时期正是“康乾盛世”的历史阶段。满洲统治者原本是信奉萨满教的，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朝，转而尊崇在蒙藏区域有着深厚根基和广泛影响力的藏传佛教，为此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国策。清王朝建都北京后，1653年1月14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顺治皇帝在太和殿设宴款待。在五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途中，即特派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等官员赠赏满、汉、藏三种文字合璧的金册、金印。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喇嘛达赖喇嘛”。这封号很有讲究，它袭了明代对大宝法王封号的一部分。蒙古王俺答汗(1507—1582)，皈依藏传佛教后，三世达赖喇嘛为普鲁汗尊号为“转千金法轮帕克喇嘛初辰汗”，承认他为成吉思汗的化身，为全蒙古的大汗，而俺答汗也赠予三世达赖喇嘛为“普通瓦喇嘛达赖喇嘛”。顺治皇帝把明代皇帝和蒙古大汗对三世达赖喇嘛的封号，加在一起赏五世达赖喇嘛封号。蒙古诸部尊奉格鲁派佛教，清廷以藏传佛教“因其教不易其俗”，采取与藏蒙一起“阐扬善教，同我太平”的怀柔安抚之道。在中央的统辖下，加强和完善对西藏地方的治理，确立系统治藏法规和行政体制，为西藏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园的国家版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见证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当时五世达赖喇嘛为取得清朝廷政权的支持，在奏章中把康熙皇帝称为无量寿佛转世，乾隆皇帝称为文殊菩萨转

世。他们不仅是大清最高统治者，还是人间之佛。藏传佛教以佛之果位遵奉康熙和乾隆，是政教制度的产物。藏传佛教神格体系有一佛多神，一相多面的特点。文殊菩萨是中国四大菩萨之一，是无上智慧的代表，又是十方诸佛母。在当时五台山佛寺360多座佛像中，文殊菩萨造像是这里最大的。清代的12位皇帝中有4位前后13次到五台山礼佛，康熙5次、雍正1次、乾隆6次、嘉庆1次。文殊菩萨之名号，梵文译法叫作“曼殊师利”。乾隆五十一年(1786)二月，在乾隆第五次朝拜五台山时，刚好适逢天降瑞雪，此情景激起他诗兴大发，写下《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诗曰：“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乾隆认为梵经中，文殊称“曼殊师利”，曼殊的谐音为满珠，而满珠就是满洲。同时，竺兰(指竺法兰)的宝号，又与“乾隆”年号相符。清官档案记载，在皇帝和皇太后万寿来临之前一年，内务府大臣要专门上报造无量寿佛事。清官会制作大量的与增福延寿相关的吉祥佛像——无量寿佛。乾隆在《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表达了长寿的愿望：“圣寿本无量，更有无量加。无量复无边，万万千千多。”佛教中寓意长寿圆满的无量寿佛，是宫中制作最多和供奉最为频繁的佛尊。

湖南博物院所藏的这两尊铜鎏金无量寿佛像，历经岁月沉淀，曾经的金光灿灿已渐褪去，但其造像艺术魅力依旧，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姿多彩的风貌。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联系人: 姜总 13572270596 地址: 029-8343629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